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路径

梅应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的重要内容，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体现，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路径。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中，《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带》对此作出深刻阐释，指出“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交相辉映的重大创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年之际，深刻把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路径，有助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绿色动能。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要通过制度设计激活自然的财富创造力，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收获金山银山，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明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科学路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生态观问题上强调“自然生产力”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辩证关系，但未能系统解决生态价值如何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中指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在《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中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这些重要论述创新性地构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路径，将自然资本（如森林碳汇、水源涵养）纳入生产力范畴，使生态保护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拓展了自然生产力的内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引入“产品”这一经济学范畴，将抽象的生态功能转化为具有明确产权边界、可交易属性的价值载体，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供了现实路径。

促进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协同演进，生动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提出，标志着生态系统治理从“资源管理”到“价值管理”的认知跃升，符合将生态环境转变成为可以交换消费的生态产品，以发展经济的方式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问题这一宏大战略命题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长期以来，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被视为相互分离的独立系统，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导致实践中出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对立的困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是“生态系统经济化”与“经济系统生态化”的双向转化，前者通过定价、交易、补偿等手段将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后者则通过收益促进生态保护，形成正向循环。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突破了传统发展范式的局限，通过引入稀缺性定价、标准化计量、全生命周期生态友好性生产，构建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协同演进的理论框架。

稀缺性重构市场基础，实现生态约束与经济激励的平衡。从供给端看，清洁的空气、淡水等生态产品的自然供给存在绝对上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产权界定、生态补偿等方式，将这种稀缺性转化为市场价格信号。需求端的变化则凸显稀缺性的动态特征。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阶梯定价、生态标签等方式，既满足了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又通过价格杠杆抑制了过度消费，实现了“需求增长—资源保护—价值提升”的良性循环。这种“以价定量”的调节方式，使经济系统自发适应生态约束，实现了二者的动态平衡。

标准性推动生态价值向市场价值的科学转化。

自然规律是标准制定的根本依据，森林碳汇能力的测算基于树种的光合作用效率，水域排污权的分配考虑水体的自净能力。社会共识是标准落地的重要保障，不同主体对生态价值的认知差异需要通过协商民主机制弥合。

现代估值技术则通过模拟市场场景，捕捉公众的真实支付意愿，为价值标准提供民意基础。技术赋能是标准执行的关键支撑，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整合遥感监测、区块链等技术，实现了生态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这种“技术+制度”的耦合设计，使抽象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精确的市场标的，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全生命周期生态友好性生产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要求从资源获取到最终处置的每个环节都遵循生态规律。这一理念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双向路径，重塑了传统生产模式，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的统一。

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构建多方共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新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本质是治理结构的创新。一方面，政府通过产权界定、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等制度供给，为市场运行划定生态红线，体现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要求，也呼应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基于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有效配置，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水权交易等市场化手段，将生态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这种“政府定规则、市场促效率”的协同模式，打破了“政府包办”或“市场万能”的单一思维，形成了政府、企业、社区、公众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共治格局。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深刻体现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机统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中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回应了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的理论诉求。

从需求理论出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突破了传统公共物品理论的局限，将生态系统服务重新定义为具有明确效用边界和市场响应的经济单元，通过产权界定和标准化计量，使原本难以分割的自然福利转化为可感知、可选择的消费对象，解决了传统环境经济学中偏好显示缺失的难题。

从供给理论出发，传统生态系统服务概念将自然界视为被动的资源供给者，而生态产品概念则强调生态主体性，关注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

从生产要素投入来看，生态产品的生产依赖自然系统，即相较于自然资源投入，劳动要素、资本要素的投入占比均处于较低水平，体现为生态主体性要素投入组合；从产出来看，传统的生产过程产出只有产品本身，而生态产品的产出包括非市场化的服务（如生物多样性），具有正的生态环境外部性。

生态产品的供给理论既不同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也超越了简单的要素报酬理论，而是构建了“人类劳动—生态响应”的复合生产函数。这既体现了创新发展对传统资源定价机制的突破，也印证了绿色发展理念下生态稀缺性价值的内生化进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构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范式。比如，江河流域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创新性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与市场化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将下游经济发展红利反哺上游生态保护成本。这种制度安排超越了简单的资源交换关系，形成了“保护者受偿、破坏者赔偿、使用者付费”的激励相容机制，使同一流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在生态保护目标下实现利益协同，破解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二元对立”的发展悖论，为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工具。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数智时代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场由技术革命驱动的生态环境治理范式革命，探索了从“科斯—庇古”范式向“算法—数据”范式的转变，通过重构生产要素组合、革新生产函数关系、重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跃迁。

生态要素的数字化重构，是数智生态环境治理范式变革的起点。古典经济学中难以界定的生态资源产权，通过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特性实现了确权。原本静态的自然资本在物联网和遥感技术的动态监测下转化为持续生成、可溯源的数据资产，呈现出典型的网络效应和再生性特征，赋予生态要素全新的经济属性。

数智技术正在重塑生态产品的供给曲线。在要素配置层面，通过部署传感器网络和卫星遥感系统，森林碳汇、水资源等生态要素的存量与流量得以实时量化，解决了生态产品价值难计量的难题。

在生产过程层面，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进一步扩展了生态产品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无论是沙漠治理中无人机播种方案的动态优化，还是红树林修复中利用神经网络算法求解，都展现出算法对生态供给效率的显著提升。这种转变使得生态生产函数向深度学习架构演进。

在价值实现层面，数智技术实现了生态产品供需行为的智能化匹配。长期困扰生态产品发展的需求识别问题，正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社交媒体数据的深度挖掘获得突破。数字平台创造的网络效应正在改变生态需求的本质属性，数字平台上海量用户形成的需求侧规模经济，以及增强现实（AR）技术实现的生态产品体验可视化，都表明生态产品需求函数需要引入网络外部性加以修正。算法驱动的价格发现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生态市场的出清难题。

这些创新正在形成数智生态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在完备的生态数据市场中，算法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通过数字化的社会偏好聚合，任何合意的生态分配都可以通过初始数据确权来实现。

这种变革的科学指导，归根结底在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生产力理论的创新突破，使得技术驱动的生态环境治理从“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被动模式，迈向“算法赋能市场均衡”的主动范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实践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助于夯实共同富裕的生态根基。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中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激活生态资源的经济潜能，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重构了发展权益的分配格局，既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代际公平原则，也契合区域经济学中的空间正义理念，形成了一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型分配机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在于将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经济资产，从而在当代与后代之间建立更加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以实现代际公平与可持续福祉。传统发展模式往往透支生态资源，导致“生态赤字”代际转移，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等制度性安排和生态权益跨期交易等市场化机制，确保生态保护的长期收益内化为当代人的经济激励，同时为后代留存发展资本。

在空间维度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打破了传统区域发展中的“生态悖论”：生态功能区往往因保护限制而陷入“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的困境，导致空间发展上权责关系不对等。而通过横向生态补偿、跨区域产权交易等机制，生态优势区得以将生态资本转化为经济收益。这种“上游保护—下游付费”的模式，实质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空间再分配，矫正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与受益者的权责错配，实现了生态正义与分配正义的耦合。

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我们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通过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制度通道。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则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指明了市场化、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构建科学合理的价值核算体系。这要求我们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系统厘清生态资源、生态资产和生态产品等相关概念的内在逻辑与边界；优化调整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态产品概念体系。

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目录及生态产业指导目录，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价值核算标准，持续优化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科学合理地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动态化、智能化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监测机制，实现对生态资产变化的实时监测和精准评估，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制度保障。

创新市场化定价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有序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提出“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为生态产品市场化定价机制的创新指明了方向。

市场化定价机制的构建，必须立足生态产品的特性。公共性生态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市场机制难以自发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因此，必须分类施策，科学设计定价机制：对于公共性生态产品，政府可通过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弥补市场失灵；对于经营性生态产品，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边际效用理论、消费者偏好分析及市场竞争机制，构建灵活、动态的定价体系。

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真正让保护者、贡献者得到实惠。”这要求完善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中央财政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流域上下游之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实践表明，明确补偿标准、建立协商机制，可以有效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同时，要探索建立生态产品损害赔偿制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

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对首个全国生态日作出的指示》中指出：“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这一方面要求通过生态产业化将生态资本转化为发展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康养休闲等绿色产业，构建特色生态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要求全面推进产业生态化转型，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通过技术创新和工艺升级，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排放，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保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这要求我们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体系：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法律法规；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考核评价机制，把生态产品价值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加强科技支撑，研发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监测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同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风险防控机制，确保改革稳妥推进。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构建产权明晰、核算科学、市场活跃、补偿合理、产业融合、制度完善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莫让“擦边球”磨损“铁规矩”

曹莉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很多领导干部一开始都是打擦边球，破坏八项规定，最终演变为大问题。”“擦边球”本指乒乓球比赛中球触及台面边缘的特殊击球现象，后引申为触及政策法规边界、钻政策法规空子的行为，实质是用表面合法的假象来掩盖不完全合法的真相。现实中，打“擦边球”成为一些领导干部规避纪律约束的灰色伎俩。然而，这看似只是轻轻“擦”过规则边缘的“小球”，实则如同一把暗藏的利刃，一寸寸悄然磨蚀领导干部的党性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口狠抓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从各地纪委监委通报的案例看，仍有部分领导干部心存侥幸，妄图以“擦边”之术行违规之实。收受特产、购物卡时，美其名曰“礼尚往来”，看似是人情往来的小举动，实则是违反廉洁纪律的开端；借集体之名，行小团体之私，将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等等。这些“变通”的背后，是“小事不拘”“法不责众”的错误思想和侥幸心理在作祟。自以为手段高明、理由充分，殊不知每一次“擦边”都是在向纪律红线发起危险的试探，每一次“变通”都在蚕食规矩的权威。

打“擦边球”绝非无伤大雅的小聪明，其本质是规矩意识被侵蚀，更是对纪律权威的慢性消解。规矩、纪律具有刚性，是铁规矩、硬杠杠。这种刚性是其发挥价值和功能的根本前提。如果规矩、纪律成为富有弹性的“橡皮筋”，就会导致“破窗效应”，最终沦为一纸空文。我们党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规定就是规定，就是要起约束作用的，就要以从严的标准执行，边界必须清清楚楚，决不能被“擦边”。

焦裕禄不允许儿子“看白戏”；谷文昌与林业打交道多年，为避免外界误解，他选择购买竹凳、藤椅和石饭桌；高德荣在女儿结婚时提出要求，不准邀请自己的同事朋友，也绝对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请客……我们党的这些优秀领导干部对小事小节近乎“苛刻”“不近人情”的要求，深刻诠释了何为坚定的党性自觉。清正廉洁要从小事小节守起，遵规守纪没有变通余地。领导干部要破除那种“小事不用计较，只要大事上不犯错误就行”的迷思，清醒认识到，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若总是打“擦边球”，对规矩和纪律的敬畏之心便会瓦解，终将从量变到质变、从小节到大错，落到底线失守、大节难保的境地。

杜绝打“擦边球”，既要依靠提升党性自觉，筑牢不想违规的思想堤坝；也要依靠严密有效的制度约束，扎紧不能违规的制度笼子。一方面，党员干部要以理论学习为“强身健体”的良方，深学细悟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精髓要义，不断补足精神之“钙”。以自我革命为“锋利的手术刀”，刀刃向内，常以典型案例为镜，在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让廉洁自律成为内心深处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紧盯奢靡享乐隐形变异的新动向，及时将快递送礼等违规违纪新形态纳入监督的范畴，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对变通操作露头即打，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同时，要织密立体监督网，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善用政务小程序等新平台新方式，让无处不在的“探照灯”照亮权力运行的各个方面，以刚性执纪让“擦边球”无处遁形。

让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

更好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

李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推动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日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了“一个优化、六个建设”城市工作重点任务，提出“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的重要要求，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明确了主攻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做好城市工作，必须深刻领悟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的重要意义，让“活起来”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更好赓续城市历史文脉、塑造城市的独特灵魂。

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记忆和情感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一座座历史名城、文化古城，对城市传承历史文脉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在北京玉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在江苏苏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积淀了前人的智慧，塑造着城市的品格，是城市韧性的支撑和城市创新的底气。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在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守护文化根脉、凝聚文化认同等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以新质生产力激发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的丰沛资源价值。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理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内涵、构成、类型，找准让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的破题切口，勇于探索前沿创新路径。比如，探索历史街区、古建筑、古民居等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所有权、使用权与经营权的分置改革，推动活化利用；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赋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探索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与未来产业的融合路径；等等。把握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文化价值与资源价值的辩证关系，让保护与传承、守正与创新协同并进，使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

推动城市历史文化更好服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建设。既要重视解决当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的紧迫问题，也要密切关注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推动解决当前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对未来具有深远影响的关键问题。今年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40周年。回望40年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中国对国际社会履行了缔约承诺，体现了大国担当。当前，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仅是为了履行条约义务，也是为了回答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如何赓续历史文脉、如何使城市历史文化服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出新问题、新要求。这就必须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拓宽问题视野，不仅要解决当前重大问题，及时总结经验，防范老问题以新形式卷土重来，还要打破思维定式，敏锐识别、研判和应对那些对未来具有深远影响的关键问题。比如，过去，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作主要关注技术应用的迭代升级问题。面对当前城市规模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要加强顶层设计，用战略思维引领技术发展，在“大遗产观”视域下，推动全域资源整合的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平台建设，助力形成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转型。

促进城市历史文化交流互鉴既有“高度”又有“温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做友好合作的践行者、文明互鉴的推动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共同开创世界的美好未来。”以繁荣城市文化推动城市发展，是城市演进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北京的故宫、罗马的斗兽场、开罗的金字塔等，都是人类文明的鲜活载体。城市文化充满活力的关键就在于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融合创新。我们要加强城市历史文化国际交流传播，在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的文明互鉴中更好激发城市文化发展内生动力。提升城市文化交流互鉴的“高度”，就要深刻总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城市赓续历史文脉、坚持守正创新的重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与其他国家城市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深刻认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道理所在、优势所在，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不断坚定走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彰显城市文化交流互鉴的“温度”，就要立体刻画中华大地上历史古都、国际都会、区域城市、传统城镇多态多元的城市文化之脉、文化之貌、文化之韵、文化之美，让我国城市历史文化更加打动人心，在持续弘扬、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现对城市独特历史文脉的更好赓续和有效保护。